

文學

由口語到書面語

*José Oliveira Barata**

邀請學者們就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思考，無疑是對他們的分辨力作一項刺激的挑戰。無論在神秘莫測的理論道路上出現何等障礙，反思一直能激發那些希望不受已成（少許）事實的羅織所羈絆以開明態度研究這課題的人。

正如許多其他情況一樣，上述情況碰到的困惑愈來愈嚴重；另外，我們所說的話很少會以文字寫下來，而寫下來的文字又很少可以說出來。但對某些人來說，如此深邃的知識道路只會局部地顯現在他們面前。

如果話語真的是最初的語言，那麼，除了現今仍備受爭議的聖經注解學外，話語很早就出現在刻有“十二銅表法”的石頭上和福音手抄本的羊皮紙文件上也會是事實，又或者，我們回顧以往，我們會發現古埃及故事的口語表達方式已奇異地一一對我們來說是神秘地一一止息於象形文字著作中。然而，上古時代的信號、符號、語符，詞音及詞義總是証實了口語先於書面語，而所口述的就是傳說及神話，這都在人類開始撰寫他們的神話之前出現的。我們應回想一下當萊維·施勞斯（Lévi Strauss）寫出以下一段文字時他對此問題所作的貼切反思：

“（……）我們習慣把“神話”及“歷史”看成兩個簡單的對立面——但這對立並無準確地被界定，而且存有一個中介層。“神話”是靜態的，我們可以見到同樣的神話元素能組成無限的搭配，但只限於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而“歷史”則恰好相反，它明顯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傳說與意義”第61頁）。

* 科英布拉大學教授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院長

另一個既不遜色也不僅可作參考之用的同樣流行的說法提醒我們，書面語會停留而話語會飛走。然而，如果我們每天都引用這古老原則來要求人們透過書面語跟自己的行為連繫起來，我們就很容易發覺到，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話語的飛走應該得到應有的關注；儘管相對於調節及監管人們使用的語言系統的規範可能會出現若干差異，然而，話語的整體創造自由都應得到關注。

飛走的話語並不是真的會消失，它們早晚會再次歸巢，或者某人會把他們收集起來，好像要強迫它們在閒逛過久後歇息一會。然而，如果說話語有一點特性，這就是它們的反叛性。雖然只存在文字（話語不會否定已過時的文字），話語會經過閱讀者的適應而在口語表達方式中，重現話語的最原始根源。任何匯編整理的工作都是我們能力所不及的，因此，我們發覺到從口語到書面語的道路並非單向而是雙向的；通過人類幻想中的小徑窄道，文化的兩種表達方式複雜地交匯，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仍必須指出，所謂民間階層因採用口語作為其表達方式而較為傾向口語，但他們絕非沒文化的階層。他們極其量只欠缺學識，因而不能把他們所講的轉變成字符、文字、書面語，而他們所講的其實是他們對價值的最清純的表達方式。總言之，是一個既真實又虛幻，很多時甚至是荒誕世界的文化表現，這種荒誕表現超脫於人們每日身處的紙章文化。

可以看到，若有充分理由修正使人們相信先有話語後有其書面語，那麼，我們便不能漠視很多時創作戲劇的人就是作家、文人，這些劇目隨後就會掉進口語的領域內，從而被確定為獨特的作品，並將那些活像永遠被囚禁在紙上的文字都釋放出來。

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善惡對立的二分法，反而口語和書面語一直朝著相互補充的軌道進行。再者，一條往來的路線迫使學者永遠不可對其作一成不變的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絕不容易簡縮。在這條路線中，容許確定一個階段始於另一個階段的等級而否定其單一性，並同時肯定這過程的複雜性。

同樣地，也難於（在科學上也是危險的）確定某一現象是典型的通俗現象，同時又有知識淵博的特點或至少在文化上有較好潤色的現象。我們都知道，在此範圍或在其他範圍內，察覺到適應的現象是普遍的。巴爾達沙爾·狄雅仕（Balthazar Dias）的人文主義為特色的話劇，雖然充滿了維森特式（Vicentina）狂熱的影響，還是被非文人階層所接納。多個世紀以來，都是以這些劇作的特點識別某種通俗幻想的作品。到了我們的時代，這種幻想已使滿載神聖與凡俗間的起伏越具明顯的新成份。

事實上，只有這樣方可解釋上述話劇之一為何能一直流傳下來。這齣話劇就是《亞歷山大戈多（Godo de Alexandria）國國王的女兒，童貞女及殉教者聖·凱瑟琳（Santa Catharina）》，劇情是講述她的殉教事蹟和光榮結局。該劇的出版生命力在整個十七世紀的無聊文學時期得到證實，並一直流傳下來，時至今日這齣話劇已由阿梅里古·達·桑托斯·費雷拉（Américo dos Santos Ferreira）用文字書寫出來，遍傳整個東北山區（聖·馬丁努－S.Martinho）。奇怪的是這齣劇除了原有角色外，還加插了兩個人物：盧斯貝爾（Lusbel）及撒旦（Satanás）。他倆打破傳統接受的推論路線而向讀者表達為國皇不良意願的動因。其他的差別則很少。我們幾乎可以大膽地說，今天為我們所認識的版本是經過多次修改的版本其篇幅已被縮減。然而，應如何理解這一份與天使在聖·凱瑟琳軟弱的時候作出解救行為剛

好相反的邪惡力量的介入？更奇怪的就是察覺到盧斯貝爾及撒旦無論在任何方面，甚至在文章形式結構中給予他們的讀白，他們都似是維森特式魔鬼的近親。在這具體例子中，使人想起魔鬼與撒旦在“神的簡史”中的對話。

在眾多作家對習慣被形容為傳統的傳說、傳奇、寓言或民間故事不斷進行的文學再構思中，我們可以遇見相反的例子。這傳統在匍匐前進且經常擾亂着我們，也是這傳統使很多渴望整理匯編它的人在轉記它時，不依循其精神及語調，而是通過自己的觀點把它過濾（認為是更有文化，更有能力修改——很多時是出於善意的一一能真正反映一個社群的事物）。

與文化的整體意義相對立的有文化子系統的特有價值。這種價值並非評論家增添或減少的那些部份，而是很多時由於方法學的因素，間歇地“孤立”起來，以便在尋找一個定義時更好地捕捉“民俗文化”的空泛意義。事實上，這是眾多具有相對自主及本身的構思機制及表達方式的子系統之一。若獨特性使該子系統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那麼同樣在評論分析的層面上，這獨特性與其他文化子系統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正如對其他子系統來說，我們正面對著一個系統化的子系統，當中的經驗傳達方式、學習的方法、傳統、習俗、社會習慣、其特有的象徵結構，都只是構成任一文化子系統——特別是民俗文化子系統——的一些較重要過程特徵。

從古至今，民俗文化都不是國家文化的同義詞（雖然有人堅持這種說法），國家文化的定義本身就包含了政治成份及含義。然而，這個政治含義對民俗文化來說基本上是陌生的。當真的如此發生，當權力想視平民及民間階層為只有單一文化的（雖是臆造的）人民，並容許以強大的權力集中來誇大一種國家情懷時，在實際上及在代表提供一個跨地區概念的單元上，可看到一個民族的文代價值面臨著逐步的及蓄意造成的窒礙。對此應該不用多舉例子了，我們更不會為此而浪費篇幅。在我們較近代的歷史，權力集中的運用、濫用，再加上面向世界時，認為這片細小的長方形土地統率著一個國家帝國的自大意識會為我們提供大量例子。但今天，這些例子仍在中美洲至歐洲泛現出來，並被理解為從大西洋至烏拉爾斯（Urais）的政治、文化單元。經過多年來限制文化對話空間及界限的無成效政治“非法佔有”後，復甦的形態今天能幸運地重新出現。

不屈從於中央集權化的考驗是這些子系統具生命力最佳證據。雖然政治權力以維護國家文化的權力代表自居，但絕不能避免不同文化方式所引發的糾紛及沖突。有時，這些文化方式還取得那麼一種不受統治權任何控制的自主力量。這些使主流文化真正變化形式的文化子系統在一個微觀世界的空間內發展起來，在一個牢固的價值網中得到保護，這些價值一代一代的保存下來，其中團結和社會—文化特徵的價值佔有優勢，因而確定了在面向想否定或排斥這些價值的人時，發揮保衛屏障的作用。在這些情況中，學者不可不知他正面對一些反映一個複雜的政治—文化局勢的跡象。語言，作為文化認別的現象，只是陳述及加強這一單元的其中一個因素。除了它以外，其他歷史及心理因素也同樣重要，這些因素包括了在這項問題的整體分析中必須考慮的多個方面，同時可試測已確立的文化的生命力及聚合性。

可能由於集中的權力沒有把已確立的價值置之不理，且如洛文（Lotman）所述般，肯定在所有的定義的基礎中有一份認為文化擁有獨特標誌的信念，因此，集中的權力開始嘗試解決一個問題，其最後的結果是產生或可能產生反叛的情況。

然而，在介紹今天還感受到、觀察到的問題，需排除任何嚴謹的單一觀念，也需排除很多學者的態度——雖然不能漠視這種立場的重要性——他們擔負起反權力的角色，早就力求適應所謂的民俗文化。很多人以誠懇的方式，另一些則以還原的方式，好像想肯定今日的超越民俗文化是遵循由人民所造和為人民而造的原則。幸運地，民俗文化不僅僅這麼簡單，學者們亦一樣。問題的複雜性迫使他們進行不斷的評論思考，這思考雖因其所選擇的觀念態度而有所不同，但一直越來越謹慎，而且拒絕了擔當“人民教師”的角色。今天，越來越能看出一個概念，它尤其有責任分擔、理解及維護作為傳說、古老習俗及同樣重要的反映存在經驗的貯存處的民俗文化。存在經驗是由特殊的價值勾劃出來的，它們關乎到生命、死亡、空間、時間、愛情、感覺、團結、權力的行使及“公平”的公正權力等方面。而這些價值是跟統一的社會內限制人類範圍的虛假價值恰恰相反的。在傳統及革新的分隔下，學者因與其民族的組織關係而需負起一個不能讓民間象徵失去意義的獨有角色，也因此使傳統不致含有貶義或處於因循的淒楚狀態。因此，雖長期承受壓力，非正式的文化子系統始終得以保存。在這個豐富的領域內，一些祖先的勸告、諺語、傳奇故事及格言、宗教習慣及迷信、音樂及以證明民風永傳不息的樂器彈奏的歌曲，以父傳子的方式傳下來、這裡面包括口語；用口語轉述給他人，讓這些人把它傳給子女。以書面方式流傳是很罕見的，因為知識的脈絡銘刻在腦海中的神秘地帶。

取得口頭文化的傳統方式有助我們理解這種非集體遺傳的記憶的主要價值，它可以學習到不論是個人與他人相處時以非正式的方式傳下來的經驗，或是作為預先設定的典禮中感受到及分享到的集體經驗的價值，甚至是透過外在因素，一如在某些文化中的非人類因素所帶來的信號。研究口頭文化——一位研究非洲口頭文化的學者曾稱這種文化為口述文化——常常給我們提供證明，當我們對它進行研究時，是如何面對著社會組織的方式，當中的個體對我們來說雖然是有代表性的角色，但在社群中及在歷史的層面上一直處於次要位置。

從這一點來看，集體記憶負有肯定的重要性。我們常常重申，在這些文化中，文章的內容被人們了解得徹徹底底。以心去徹底了解使我們聯想到一種有感情的了解，一字一字的，使其不能排除這項知識系統化的機械式重複特性。然而，雖是如此表現出來，我們絕不能準確地認為這個過程是一種不變的東西，是純粹的沒頭沒腦的重複人們相傳的話。因此，在這個範圍或對其他正式的文化而言，我們正面對著一個擁有本身規則的計劃；一個有規則的系統使人能夠從一篇文章中直接將經驗演繹出來。若是如此，則有需要研究這一種文化的真正語言。在大多數的例子中，這種語言與龐大的文句語料融為一體，但這些文句語料並不一定符合起即時補充作用的一般規則及完善地設定的符號，這樣，就可以與系統化文化作出一種有意義的比較。這系統化文化較容易通過機制性的支持（如學校、出版界等等）而匯集為編。

這文化中，主要的價值及傳統被融匯成一個聚合體系。這個體系是由支持上述價值及傳統的文化基礎所維護及保存，最終為這些價值及傳統提供一種相對的因循守舊的概念，就像想保存已建立的東西，亦因此而由一些機制來界定及傳播。這種文化的記憶之所以永存不滅及廣為流傳，是因為我們發現有為其服務的生產、再生產及有系統地使用的社會機器。以前或現在，該文化的大部份都是一個階層作特別思考的對象，這群“精英”很多時因珍惜其優勢而維護這文化及使之永存不滅，有時會重量多於重質。事實上，依循已經歷過的道路走，總比投注於革新的價值上更

為容易。所以，有人這樣說：“……使用所擁有的思想工具來傳播文化，不論是採用學校的教學材料，抑或使用那個改變整個以前是黑白、現今是繽紛多彩，但並沒有因此令世界變得更快樂的魔術箱。”

我們知道有系統而極嚴謹的方法能加深人的記憶。任何革新的工作往往很容易被人拿來跟其先例作比較，不管先例是最近出現的，抑或是發生已久的，因為，仗著書面語的權威性，這先例一旦用文章形式記載下來，便具備了確定的價值。記憶固定和棲息在一種文字的極豐富的符號語料內。因此，要作出任何改變總是比較困難，因為改變是會抵觸文字所確立的價值，亦抵觸鑽研文字並專門受訓於多媒體社會中從事文化現象研究者所思索出的一門學問的比重。這些瞬即成為文化、文學遺產的文章會歷久不衰，它們的強大生命力反映出一種集體記憶，儘管這種記憶是以頑梗不變——不斷重複——的方式形成，它跟其本身所採用的符號的生命力同步而行。符號將記憶記錄下來，使它具有重要的文化遺產價值，並將它“炮制”成一種永不磨滅的記憶。自古至今也是這樣。儘管我們基於防範反應而拒絕與大眾化建議妥協，然而，必須承認我們現今擁有的各種各樣用來固定文化的方式確實能帶來一些無可爭議的益處。今天，距離谷登堡（Gutenberg）的時代已遠，在我們傾向於追捧“潮流”時，必須懂得保持一種健康的客觀態度，這態度無可避免地要接受現今的挑戰，甚至要跟這些挑戰展開艱苦的鬥爭。譬如，我們可以回顧博伊斯（Boecio）和卡西奧多魯斯（Cassiodoro）僧侶曾擔當的重要角色，他們在歐洲文化一度出現斷層時就明白到將古人的文字記錄下來是何等迫切；他們抄錄文章，也就是將一門學問、一種神話式的記憶定形，這些記憶部分已跟歷史混淆，被歷史同化。假如這些遺產沒有得到流傳，今天，我們絕對不會是現在的模樣。同一道理，假如在特呂福（Truffaut）執導“Fahrenheit”之前，亞歷山大圖書館沒有被摧毀的話，我們對自己和其他事物的認識必然更多。我們都知道抄錄者的工作範圍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我們看見的是重複式知識的流傳，這樣的知識對自由創作空間——任何創作行為的基礎——造成本質上的損害。文化和口授知識的流傳卻出現不同的情況。在這方面，流傳的課題反映著一種集體記憶，並揉合成一種文化語言。這些課題的生命力並不取決於在同一文化中是否有文字符號的存在，在某些情況中，很難同時見到課題 / 符號共存，甚至難以在它們之間確立任何優先地位。我們很容易察覺到民俗文化的“保守”性，主要是跟流傳的具體內容有關。事實上，使這種憑記憶複製的知識得以永恆的機制帶領我們去追溯過去，而我們對於過去的認識祇限於“事後”的認識。

也許正因如此，這種知識對我們來說永遠是一種追溯已往的知識，由於它本身的規範極為嚴謹，表面上它是不符合於現實，我們亦唯有因循地去理解它。事實上，這些課題的生命力是相應於一個層次體系，這體系只能是一個世世代代都堅決保護和流傳的價值的特殊層次體系。另一方面，聲符的生命力同結構、社會、根基等因素的持久力有關，總言之，是同特別扎根於民間社會的群體的自覺性有關。然而，有說這並不是一種遺傳自集體的記憶。由於這記憶的流傳不受結構化符號造成的嚴謹系統的約束，它的緣起造成流傳上的一些缺點。記憶與遺忘互不相讓，從而在民俗文化方面提升了流傳的革新功能。事實上，憑記憶獲得的知識的嚴謹性只屬表面的。所流傳的肯定是一種社會生活的祖傳銘記。而事實上，這種對過去的記憶是不停地遭受社會中日常生活的沖刷。起初，可能基於傳統而抗拒陌生的結構，但我們知道新事物是必定會逐步融入的。由於缺乏書面形式的符號，加上歲月的消磨

和世代之間的罅隙而導致記憶的喪失，想像的事物便不斷強化，成為最終被符號完全接納的補充性文章。面對著遺忘，口授的傳統較易接受記憶的更新，它會求証於偶爾權充歷時分析學的過時資料，徘徊於力求鍾情現實和重新利用一個奇異、神妙而陷入末世般混亂的世界之間，在這個世界，感覺似乎是寄居於麻木之中。將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兩種系統作比較時，可以說我們面對的祇是一種題材性質上的分別。然而，這分別是極之重要的，因為，假如是對那些獲賦予文學地位的題材而言，我們的工作便集中於一種素材，在這素材內，任何改變都會融入一個能輕易地察覺其變化的系統中。至於口頭文化方面，話語——敘述結構很少能符合已確立的文化為它們訂定的傳統價值。當重新肯定民俗文化有時會是一個比詆毀這文化的人所渴望的更為開放的系統時，我們便知道不斷更新是如何受制於想象，且反映出社會群體中每一分子的重要想象事物。

對希臘文化來說，吟詠詩人和游吟詩人被視作界定沿襲和創作的依據，他們之間的分別似乎在（口頭文化 / 書面文化）互相作用二元論中得到現實的確定。從語源的角度來說，吟詠詩人是指吟誦讚美詩（頌詩）者，重複著樂節，“像個補鞋匠般縫補”（詠句）。因此，敘事詩片斷的價值在於它成為通過一名藝術表演者去複製集體記憶的機械化表達形式。相反，游吟詩人則找尋靈感來譜創新曲，儼然是一個藝術創作者。荷馬（Homero）跟不見經傳的吟詠詩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能透過聲音使我們今天當作敘述規律來研讀的重要文章的連續推論邏輯得以保存下來，起初，這些文章就像熟練地、細意琢磨地砌成的“拼圖”：《伊利亞特》（*Iliada*）和《奧德賽》（*Odisseia*）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今天翻閱這些作品，從中可以看到用“未定型”的小品文方式講述的一個民族的神話——歷史故事；我們閱讀這些作品時，是從它們的文章組織去研究，並應意識到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的集體記憶和探求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的敘事詩是在不斷更新的。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到一種現象，儘管經過文學階層的研究和從理論上對其作出闡述，但這現象帶有全部藝術創作的普遍性，而且，當我們今天談論這些口頭的作詩方法時，絕不會覺得這現象是過時的。

對現實的仿效——模仿能力——並非不受非議的。具創造性的模仿總是富有詩意的，因為它能創造新穎的事物。面對著現實，應採取的態度並不是抄襲（模仿一仿效），而是追求詩意。換言之，創作者將已有的事實摧毀，然後將它重新建設起來。假如這種機制是真實的，且被證實是適合於用文學性質來制作和稱譽的文化系統的話，那麼，當然不適合於民間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口頭傳述的傳說和傳統等範疇。由於其外殼和主要特點的純樸，民間詩歌確証了詩人如何與欣賞者對話，而後者能拋開既定規則所造成的偏見。

民俗文化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回應寂寞、失望或安樂，使所有詩人都用話語去重整世界詩學。

口語和書面語之間其實沒有很大的距離。需要注意的是，在口語世界中，人雖然銘記著本身的歷史經驗，但欠缺利用論述將這些經驗概括的機制，所有回饋都是用比喻的方式表達。思想和行為本質上是互相聯繫的，而且在一個主要由集體經驗所劃定的時空中有某部分是一致的。

文字要求思想和行為之間要有分離；書面語要求完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級別，

可能是較為線性的級別，不同於在口頭文化中隱藏著思想和行為的循環性。不要以為當確定本文經常避談的二元論時，我們便是承認這方法論的正確性，實在有需要強調這一點來再次肯定口語的表達方式是無法嚴謹地加以整理的。正如我們支持保羅·森多爾（Paul Zumthor）的說法，我們可以為口語設定四大類別，儘管它們之間的分野並不明確。第一類是初級的口語，它跟任何書面形式都絕對扯不上關係。第二類是混合口語，在這類口語中，它和書面語以不同的比重和價值共存共活；在這種情況中，書面語祇能產生局部影響，有時祇對社會的外圍產生影響，而且，一些具體的成果往往反映出影響作用的遲緩性。相反，另一類屬於中級口語，在這種情況中，口語衍生自書面語，而書面語成為民間社會“據為己有”的具威望的法規。最後一類是附屬口語，尤其在現代，是透過大眾傳媒特別是無線電廣播，以及透過磁帶錄音來傳播的口語。今天，在我們之間很難找出初級口語的痕跡，由於無法找到文件記錄，這類口語的祖傳特質已難以察覺。因此，就我們的口頭民俗文化而言，利用混合口語和中級口語兩種系統的互相調和較易找出這種文化的特點。重要的是，研究這文化時必須兼容上述兩種原素，這樣，就不會因為將書面形式加諸主要屬口授傳統的短篇小說、傳說和傳統等身上，而令它們中止本身的生產循環系統。正常情況亦是現在發生的情況是，轉化成書面語能產生催化作用。在作為書面文學緣起的參考文章存在的同時，我們察覺到各種各樣的口語版本在不同時空繼續產生。

為一些複雜的現象分類往往會為我們帶來減慢工作進度的弊端。然而，假如處理得宜的話，這些分類會成為有用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中，口語跟書面語的結合，或者說是它們之間的轉化，證明了一種混合語系統跟另一種中級口語系統是共存的。再者，歷史給予我們大量例證，已透過字符組成文章的福音出現了多種未正式收入正經的新版本，且廣為流傳，這些版本最終亦變成書面形式。在這些珍貴的經文中，真實的資料被改變；神化的優勢——繼承自拜占庭文化——在門徒遺留下來的文章中苦行色彩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文章中，亦能察覺到在巴勒斯坦小村莊的社會組織中日常發生的事情和資料的不斷融合。儘管有書面語的存在，口語仍然不斷豐富，所謂添油加醋，添枝加葉。因此，口語和書面語之間不能分離，它們有的是互補的關係。

知道無法在這領域內找到統一的方法學途徑之後，自然不應該抗拒採取一種跨學科觀點的可能。這樣，我們中間的那些在口頭文學中獲得了豐富寶藏的人似乎是有預感的。

實証方法學提供給我們大量資料，進一步說提供了我們今天仍在鑽研的語料，它盡力確定本身的多樣化、民間文學的多姿多彩和它各種各樣的表達方式。這種不斷的明確的追根溯源終於帶來了適當的答案，解釋和闡明或更能說有助於解答方法論方面的問題。因此，閱覽加雷特（Garrett）、特奧菲盧（Teófilo）、利迪·達·瓦斯孔塞洛斯（Leite de Vasconcelos）、康斯格利埃利·佩德羅素（Consiglieri Pedroso）、卡羅利納·米夏埃利斯（Carolina Michaelis）等人的先鋒作品時，是面對一套充實而嚴謹地編制的語料，時至今日，它一直成為進行過去數年間不斷地更新改革的必要思考的出發點。在塑造這些珍貴變革的觀點下隱含著一個意念，就是這方面的所有工作都必須是一種系統化的領域性工作，從葡萄牙人的習俗、信仰和傳統中尋找“葡萄牙民族”，使我們能夠為本民族心理記錄方面的基本工作之一的標題加以註解。然而，科學的進步是永無止境的，這使得我們

今天必須認清各種不同的工作，這些工作雖然是零散地進行，但一直在研究我們今天試圖在本文扼要地論述的複雜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是疑問多於肯定的。由普羅比（Propp）提出的有爭議性的詞法形式，到洛特曼（Lotmann）的符號學研究，以至吉爾伯特·杜蘭德（Gilbert Durand）對“想像中的人類學結構”所作的基本研究，目的都是希望有助於解釋清楚一些目前仍然難以完全理解的事情。

然而，從求知的角度而言，我們認為應該去探討極之久遠的古代知識。基本上，流傳的機制可能沒有產生過本質上的變化。事實上，我們認為“虛構事物”（由某人首先提出的事物）的概念仍然有其效用。這些“虛構事物”，即口頭敘述及很多時更是記憶中的故事，要“忍受”“理性”（“並列理性”）地對它作出無情的重新排列，最後在一種神話學中構成一個成分複雜的組織。這一點是很容易看出的，正如古希臘拉丁時代就是異常突出的例子。這一切還未足以解答方法論的問題；基於這一切，今天我們的工作必須要跨越狹隘的實証主義，在文化古文解釋學的道路上重新尋求各種主要適應現象的原因。

誰主張固定極豐富的文化遺產，他便負起重要的使命。

這特殊的職責源於我們在上文試圖探討的問題，但同時亦來自一種文化態度，一種有時候我們面對大眾時採取的且值得我們加以思索的態度。

事實上，今天在重審民俗文化價值的意向不斷膨脹的同時，疏忽了利用很多真正屬於同一文化中的事物。由具商業價值的民間藝術，例如任何其他“進出口”產品，以至巧妙地改變成適合上層社會消費的民間“設計”，這些上層社會的人士身穿披肩、腳踏木屐，似乎緩和了他們不自認為平民的不良意識，消費社會的邏輯就是永無厭足。在對於新鮮事物的貪求之中，由於本身的幻想力枯竭，便會毫不猶豫地“入侵”其他文化領域，使這些文化領域經常被貶稱為樸實無華、鄉村純樸等。我們甚至會看見一些掩飾不當的偽善行為：知識階層的“善良目光”憐惜著這些文化被排斥的現象，不會耗盡“天然的蘊藏”，那裡任何事物都是一件有如“獨特吉祥物”的戰利品。

用書面作出的口語與口語或書面作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為中間加添的連接詞使兩者不能直接結合；中介物的介入逼使兩個領域分開，使所有無論是口頭或書面的文章都具有的奇特迷人策略更為誘人。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認為要嚴肅地與民俗文化接觸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在我們的文化政策藍圖內，民俗一欄不幸地仍有待填補。但必須填補，必須以一種有關和必需的多元模式去填補，而且要清楚知道我們正在認清和在一個主導的既定系統中將新的價值集合起來，這些新的價值祇祇會不斷累積和為我們間中會對自己在世上的有限性所抱有的單一觀點和賦予其更完整的意義。

赫胥黎（Huxley），奧威爾（Orwels）的啟示錄式觀念將被打破，因為“時間永不停頓”，有時，未來就是過去的重閱、過去重新適應和為過去加添時代性。